

通向奴役之路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 著


滕維藻 朱宗風 譯

張楚勇 審訂

商務印書館

目 錄

代 序 林毓生	i
導 讀 張楚勇	vi
原書序言	xx
前 言	xxiii
引 論	xxvi
第一章 被委棄了的道路	1
第二章 偉大的烏托邦	14
第三章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23
第四章 計劃的“不可避免性”	34
第五章 計劃與民主主義	48
第六章 計劃與法治	65



第七章	經濟管制與極權主義·····	81
第八章	誰戰勝誰？·····	95
第九章	安全與自由·····	114
第十章	為甚麼最壞者當政·····	129
第十一章	真理的末日·····	149
第十二章	納粹主義的社會主義根源·····	163
第十三章	在我們當中的極權主義者·····	179
第十四章	物質條件和理想目標·····	200
第十五章	國際秩序的展望·····	218
第十六章	結論·····	237

代 序

林毓生

海耶克先生在思想和人格上最顯著的特徵是：知識貴族的精神。他的身教與言教給我一個重要的啟示：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不存在*應該或不應該*追求的問題；*只能*盡最大的努力。（在尚未進入這個過程之前，當然有應該或不應該追求的問題。）追求知識（或曰追求真理）是艱難的。在這個過程中，你如不認真，不努力，那你是在追求知識嗎？追求知識有其獨立性與自主性，用英文來講，可以 intellectual autonomy 來表達。這種知性活動不受外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勢力的干擾，也不會為了趕時髦而從事這種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一旦有所發現，即使不被外界所了解，甚至被外界誤解、曲解，也*只能*堅持下去。這裏也不存在應該或不應該堅持下去的問題。

這種在知識領域之內追求知識的人，如果獲得了重大的、原創的發現，他當然深感知性的喜悅，卻不會產生恃才傲物、自鳴得意的心態。因為他是在追求知識，不是在追求虛榮；何況知識邊疆的擴展，使他面對的是知識邊疆以外的無知領域。他深切知道，他的成就是建築在別人的努力所積累的知識之上，即使

他的最具原創性的發現 —— 例如，他發現（在法治之下的）市場經濟是產生、保存、協調、流通與增益知識的最佳機制 —— 也間接與他的師承有關，與奧國學派經濟學和蘇格蘭啟蒙傳統有關；所以，他在知性生活中有所歸屬。1999 年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舉辦的紀念海耶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系列演講會上，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 Gary Becker 先生曾說：僅就哈氏在經濟學領域之內的貢獻而言，如果他一生只寫過那一篇發表此一重大發現的論文，就足以稱謂二十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那篇論文是於 1945 年 9 月發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的“*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夏道平先生譯作“散在社會的知識之利用”。此文已收入哈氏著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1948]。）

另外，他永遠是以開放的心靈、知性的好奇心，面對別人的意見，樂意接受別人對他的啟發（如上世紀 50 年代，他的思想頗受博蘭尼[Michael Polanyi]的知識論的影響，便是顯例）。對於別人的批評，他當作是刺激他反思他的思想的材料。對於別人的誤解，甚至惡意的曲解和侮蔑，他也只看作那是別人在知識上的盲點，所以無從產生怨恨之情。他的成就感只能帶給他知性的喜悅，卻不會產生知性的傲慢，當然也與孤芳自賞之類的偏狹心態無涉。海耶克先生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發現，另一方面卻又以開放的心靈面對別人的不同意見；此種“堅持”與“開放”，看似相反，實則相成，因為一切是以忠於知性的追尋為準。

這種遵循理知的召喚與指引的人格素質，展示着——用韋伯的話來說——知識貴族的精神。知識貴族，不是甚麼社會貴族，也不是經濟貴族。知識貴族的精神乃是——不是多數人做得到的——在“諸神戰爭”的現代性文化中，始終堅持忠於知性神明而無懼於其他神祇的精神。

海耶克先生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殷海光先生語）。不過，凡是跟他長期接觸過的人都會感覺到，他實際上是一個內心熾熱，具有強烈道德感的人。當他談到自由的意義，以及自由被誤解的時候，雖然語調仍然嚴謹，但常常會血脈賁張，臉龐通紅。然而，他卻那樣習於自律，而且做得那樣自然，那樣毫不矯揉造作。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他這樣的風格，主要不是源自刻意的道德修養，雖然在道德上他確是一位謙謙君子，而是強烈的知性生活的結果。知識是他的終極價值，追求知識賦予他生命的意義。這樣發自內心的知性追尋，把作為一種志業的學術活動提升到具有高貴和尊嚴的生命層次。

由於西方現代社會和文化已經出現了深刻的危機，產生了種種價值的混淆，這種精神在許多西方學者和知識分子身上已經很難見到了。

殷海光先生的身教與言教的最顯著的特徵則是：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精神。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看到同胞的苦難與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必然感同身受，不能自己。他會盡一己之力以言論介入公共事務，

希望能夠指出在公共領域之內的諸多問題的解救之道。這種入世的使命感使他不消極、不氣餒、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靜思，也不玩世不恭（那樣的表現當然也有；不過，那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另外一個殷先生的精神特徵是：在政治權力與社會及經濟勢力之前，保持着人格的獨立與真誠。這種公共領域之內的道德完整性，乃是中國知識分子最主要的精神資源。

不過，在他的心靈中，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精神產生了轉化，因為他畢竟清醒地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洗禮。所以，他的道德精神更能超越一切藩籬（家族、地方、學校、黨派、種族、國家）的限制，更能接受理性的指引，以及更具有個人主義的特質。（這裏所指謂的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體主義而言。它是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與“安那其”〔anarchistic，無政府〕個人主義不同。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並不反對國家的存在，毋寧主張國家需要存在與發展，國家的目的是在法治之下，如陳獨秀在 1914 年所說，“保障權利，共謀幸福”。）

殷海光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但他卻反對“本能的愛國主義”。他的早年性格中確有狂飆的一面，但卻歸宗於真正具有獨立性的自律。正因為他的關懷具有超越性，所以他更能使它落實到具有普遍意義的，不可取代、不可化約的個人價值（th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與個人（每個人）的尊嚴與發展之上。（這裏所說的個人價值，不是英文中的“value”，而是“worth”。中文在這方面，不夠細緻，不夠分殊，所以“worth”和“value”都

只能用“價值”兩字譯出。因此，我在這裏談到殷先生所堅持的個人價值時，需要用“不可取代、不可化約”來說明它的特殊意義。) ¹

1 本文取材於林毓生著《政治秩序的觀念》(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頁 236-240。

導 讀

張楚勇

一紙風行

1944年3月和9月先後在英、美兩國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既令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聲名大噪，也同時令他聲名狼藉。

這本書讓海耶克聲名大噪，是因為這本討論政治社會理論的嚴肅讀本，竟然成了當時暢銷一時的書籍。

據第三任英文版海耶克全集的總編輯 Bruce Caldwell 說，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估計他們的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自出版以來，銷售量已在 35 萬冊以上。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一大原因是此書美國版出版後不久，美國的《讀者文摘》即決定把它的摘要轉載，並且替其書會出版和發行摘要的單行本。Caldwell 表示，《讀者文摘》當時的發行量約在 875 萬冊左右，因此據估

計《通向奴役之路》的摘要單行本最終印行了超過 100 萬份。¹

《通向奴役之路》出版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政治秩序進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形對峙的冷戰格局。把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批評為是侵犯個人自由的極權制度的《通向奴役之路》，其立論雖然很具爭議，但它的主張在意識形態爭持不下的冷戰年代，卻同時受到敵對的兩個陣營一致的重視，致使海耶克的這本書洛陽紙貴，甚至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海耶克最為人所熟悉，和最多人閱讀的著作。

就華語世界而言，戰後台灣，在海耶克的首位華人學生周德偉的推介下，殷海光早在 1953 年便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他選譯的《到奴役之路》。中國大陸對海耶克的著作也很重視。本書譯者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在 1958 年便翻譯了海耶克早期的純經濟學著作《物價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北京商務印書館在 1962 年也出版了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為內部發行而翻譯的這本《通向奴役的道路》。

到了今天，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圖書館的書架上隨意瀏覽一下，便找到八個不同版本的中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說這本書使海耶克聲名大噪，我想是絕不為過。畢竟，知道海耶克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的人，恐怕要比知道海耶克為甚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多得多。

1 見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Volume II, The Road to Serfdom: Text and Documents, the Definitive Edition*, Bruce Caldwell (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第 1 和第 19 頁。

不過，這本書同時也使海耶克在一些學術圈子內變得聲名狼藉。

海耶克在撰寫這本書時，大概也有類似的顧慮。在原書的前言中，海耶克一開始便說他有責任解釋清楚，為何作為一個專業經濟學者的他，要寫這本很具爭議的政治書。海耶克的解釋在當時的經濟學界似乎作用不大，因為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本書代表了海耶克放棄了嚴謹的經濟科學的研究，不務正業地去當政治評論員。一些經濟學者甚至認為，海耶克由於在 1930 年代跟主導經濟學的凱恩斯在相關的經濟理論辯論中敗陣，因此轉而投身到經濟學領域以外的地方去。不管如何，在戰後當海耶克希望離開他任教多年的倫敦政經學院，轉投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時，即是在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多方努力下，芝大的經濟系都不聘用海耶克。最終他只能加入芝大的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

在經濟學界以外，一些重要的學者對海耶克這部書也不以為然。思想史家柏林 (Isaiah Berlin) 1945 年在閱讀《通向奴役之路》時，以“可怕”(awful) 來形容海耶克。哲學家卡爾納普 (Rudolf Carnap) 當時寫信給海耶克的好友波普爾 (Karl Popper) 時，引用左派人士所說的“反動”(reactionary) 來形容海耶克的觀點。政治學者 Herman Finer 更撰寫了一本《通向反動的道路》(*The Road to Reaction*) 來反駁海耶克。²

不過，今天離《通向奴役之路》首次出版已 70 多年了，人們看來還在繼續閱讀和出版這本書，繼續研究海耶克的思想。究竟

2 *Ibid.*, 第 2 和第 21 頁。

為甚麼會這樣的呢？

劃時代的意義

讀者如果單是細讀《通向奴役之路》的文本，可能得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海耶克對極權政治鞭辟入裏的批評。海耶克在這本書中，很希望澄清當時他認為的兩大流行的誤解。首先就是西方知識界普遍以為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走向末落時的極端反撲，其政治性質被認為是與社會主義南轅北轍的。其次，不少西歐的社會民主派政治力量相信，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是共容的，在民主政體下，政府通過理性規劃來節制自由市場的“盲動”以達致社會公義的結果是既可取又可行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它剛發表的那個時代，其直接的現實意義就是試圖糾正上述這兩大流行的誤解。

海耶克對當時這兩個流行的“誤解”有強烈的看法，是和他 在 20 世紀頭四十年前後在歐洲的德語社會和英語社會長期生活和研究比較有關的。1931 年以前，年輕的海耶克主要在說德語的維也納生活、讀書和工作，並曾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役，學術上則主要承繼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自由市場和主觀價值理論。他在成長時有一段時間曾經受到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潮所吸引，但他看到不少原先是服膺社會主義思想的德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一戰敗戰後逐步走上擁抱納粹主義及其極權手段的道路。他們開始醒覺到，儘管在納粹德國興起前社會主義黨人和納粹黨人之間的政治鬥爭不斷，但他們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邏輯

如果推到其根本處，是極其相似的會走上極權政治的道路。

因此，當他在 1931 年移居英國到倫敦政經學院任教後，對英國溫和社會主義者普遍認為納粹主義的興起，是經濟大蕭條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窮途末路式的極端反撲這一類觀點大不以為然。海耶克認為，西歐的溫和社會主義者如果頭腦清醒地作出反省的話，理應認識到社會主義對政府管控市場和進行中央規劃的主張，如果要有效而徹底推行的話，免不了要在政治上實施種種侵害個人自由的舉措，最終和納粹德國一樣走上全權統治的道路。海耶克相信，英國的工黨和社會民主派缺乏這種認識和體會，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自己年青時在德語世界的經歷，另一方面也因為英國的自由和法治傳統很強大，使這些左傾思想的人士誤以為就是加強政府管控也不礙事。加上二戰期間，戰爭的動員需要已使大家對政府集中規劃習以為常，海耶克因此覺得更有必要對此“誤解”進行批判。

把社會主義和納粹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邏輯連結起來，海耶克的用意其實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和所推行的暴政，如果簡單地把責任完全歸結到德國人的民族性或納粹主義身上，那便是無視了德國文化同屬是歐洲的共同文化的一部分這一事實，也忽視了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會產生極權的可能。海耶克在撰寫《通向奴役之路》時，已預期盟軍最終將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因此，如何在戰後的秩序重建中，面對根本而真正造成極權暴政的因由，更好地認識、重塑和維護自由文明所賴以茁壯的思想資源和相關的制度傳統等，便是頭等重要的事。釐清社會主義和納粹主義的關係和澄清上述

的“誤解”，正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一大任務。

在學理上論說清楚為何維護個人自由跟維護自發的社會秩序是分不開的，以及為何不應該盲目迷信理性萬能，以為理性規劃的制度必然可以取代，或優於社會上自發的調協制度（如市場、普通法、道德習俗等），正是海耶克澄清上述“誤解”的依據。他認為依靠政府干預市場以達致某種通過一些抽象推理預先假定的平等或公義結果，不但會破壞人類長期自發互動中累積下來的社會協調機制，更會直接干犯個人自由。在現代複雜的社會中，由於對社會互動協調的知識是散落分佈在社會不同角落的個人身上的，因此在缺乏例如自由價格這類自發形成的機制的情況下，中央式的理性規劃根本不可能盡知相關而瞬息萬變的資訊，至使干預往往不能帶來預期的結果，反而使當權者為求目的，不斷加強干預的力度和範圍，一步步迫近全權的暴政。³這便是海耶克為甚麼不同意經濟平等可以和政治自由相容，並在《通向奴役之路》對英國工黨及其理論領袖拉斯基（Harold Laski）當時提出的工業國有化主張不斷作出批評的理由。

換言之，《通向奴役之路》之所以受到重視和引起廣泛的爭議，在當時是因為海耶克尖銳地對進步知識界達成的一些重大共識提出了異議。而這本書和海耶克的思想至今仍舊在學界和知識界備受關注，是因為海耶克的立論根據，其實是針對西方文明自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的高度推崇的唯理主義（rationalism）作根

3 見〈散在社會的知識之利用〉，夏道平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Friedrich A. Hayek 著，修訂版，遠流，1993，第四章。

本性的批評，認為唯理主義錯誤的以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應用到所有人類的認知範疇之上，盲目相信理性設計本身在方方面面都優於傳統智慧或實踐經驗的累積，任何不合理性標準或理性不及的東西都是比理性低劣的事物，理應被理性淘汰。海耶克相信，現代的唯理主義是對理性的濫用。⁴ 這種濫用並不單局限在例如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政治意識形態上，而是廣泛地存在於近現代歐洲文明的某些強大的思想資源之中，不斷地挑戰着歐洲文明中的自由傳統。因此，對海耶克思想的關注超越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空，也超越了冷戰的年代，因為他的理論、批判和對理性、自由等根本問題的反省，對歐洲文明和現代性到了今天還是有相關的意義，其立場觀點仍舊有啟發性，這就是為甚麼人們現在還在閱讀和討論他的著作。

《通向奴役之路》是海耶克第一本非專業經濟學的著作。我們與其說他從此放棄了嚴謹的經濟學分析，不務正業地從事政治評論，不如說《通向奴役之路》標誌着海耶克突破經濟學的局限，認識到要充分、深入而全面了解社會的種種秩序和現代人的處境，稱職的思想家必須同時要進入政治學、法理學、思想史、哲學心理學、方法學、自然科學等領域作出跨學科的研究。在此以後，海耶克在這些方面先後發表的一流著作，確立了他成為其中一位 20 世紀西方思想大家的地位。從今天這個角度看來，《通向

4 參考 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Liberty Press, 1952, 2nd edition 1979。

奴役之路》使海耶克聲名大噪，遠多於聲名狼藉了。⁵

海耶克與中國自由主義⁶

海耶克的思想，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在一些方面發揮着關鍵的影響。近年這一點愈來愈受到華文學界的關注。周德偉、夏道平、殷海光都是在上世紀 50–80 年代的台灣，通過譯作和著作，有力地推介海耶克思想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林毓生同時是殷海光和海耶克的學生，在周、夏、殷這一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基礎上，於 70 年代、80 年代，以至現在，進一步深化和推動海耶克克服膺的古典自由主義如何與中國傳統開展對話，希望通過“創造性轉化”的方式，把中國傳統中可以和值得改造或重組的東西，變成有利的文化資源，使自由、民主、法治等現代價值和制度，可以在中華文化的環境下生根成長。

自從清末嚴復等開始引進西方的自由思想到中國來之後，中國自由主義雖然一直受到來自傳統的衛道思想和來自社會主

5 海耶克在發表了《通向奴役之路》之後，在不同學術領域發表的代表作，除了上面注 4 的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之外，還先後有 *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 Their Correspondence [i.e. friendship] and Subsequent Marriage* (1951), *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1952),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960),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umes 1-3* (1973, 1976, 1979), 以及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1988)。這篇導言篇幅所限，我不能較全面的討論海耶克的整體思想。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計劃在 2017 年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的拙作《政治思想家：海耶克》。

6 此一節的論述改寫自拙著《政治思想家：海耶克》第十章。

義式的革命思想的雙重夾擊，但通過新文化運動旗手之一的胡適等人的努力，一直以來還算得上是五四運動之後，在中國思想界中一股重要的思潮。但到了 1949 年之後，中國自由主義者在大陸有三十年可以說是踟躕不前。在這段期間，通過海耶克思想對台灣自由主義者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使中國大陸的思想界在到了改革開放政策出現之後，從台灣的自由主義者那裏再次有機會承傳了中國自由主義的命脈。

我看到最早以一整篇的篇幅來討論海耶克對中國自由主義影響的論文，是 1992 年熊自健發表的〈戰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為例〉。⁷ 觀熊自健這篇文章認為，海耶克對殷、夏、周幾位台灣自由主義者在思想方面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海耶克的自由經濟思想從根本上改變了台灣自由主義者以為“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是可以同時並存的看法。第二，通過海耶克在《自由的憲章》等鉅著的分析，台灣自由主義者大大加強了對自由的價值、自由條件的保持、自由與法治的關係等認識。第三，通過海耶克對真偽個人主義的辨識和對自由主義倫理基礎的探索，台灣自由主義者開始毫不含糊地提出“把人當人”這種“康正的個人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根據。

張世保在〈“拉斯基”還是“海耶克”？——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中的激進與保守〉，以及林建剛在〈從拉斯基到海耶克：胡適

7 熊自健，《當代中國思潮述評》，文津，1992，第 1-42 頁。

思想變遷中的西學》⁸中以一些具體的例子，進一步闡述了中國自由主義者如何從戰前服膺同樣是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的拉斯基的社會民主派的“經濟平等”主張，轉而到在戰後接受了與拉斯基針鋒相對的海耶克的“經濟平等”與“政治自由”是不能並立的論述。張世保的文章也指出了因為受了海耶克的文明演化思想的感染，中國自由主義者從反中國文化的激進立場，轉而開始重視中國傳統本身，為中國自由主義在這方面促成了一大轉向。

海耶克的理論除了影響到 50 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者作出思想上的改變之外，到了 80–90 年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大陸知識分子身上，海耶克這本《通向奴役之路》，帶來的卻是印證了預言般的震撼。

目前在中國大陸思想界很活躍的秋風進一步提到在這方面海耶克理論的雙重意義。首先，海耶克基於有限理性的英式自由思想，開展出對文明演化的解釋，指出了在文明內的制度和傳統做法往往並非是個人理性或設計意圖所造成的結果；人類文明中的大多數實踐知識也是體現在那些不能以理論知識或語言完全闡明的理性不及的制度和習慣做法之中。這些制度和做法雖然行之有效，卻不一定能為人所意識到或以理性語言完全演繹出來。這些做法多是包含着長時間累積下來但卻不能明言的豐富經驗和判斷。而我們去跟從這些制度和做法賴以構成的規則，正是文明得以運作之道。要創新改變，依這樣的思路推演，也只得在邊

8 前者見高瑞泉編，《自由主義諸問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3-33 頁，後者見《理論視野》，2013.10，第 61-63 頁。

際上進行和採用內在的批評，靠同一文明內被廣為接受的做法作為標準，修正文明內在當下產生爭議的做法。如果我們以為可以有一外在於相關文明的理性標準全面地建構全盤的改革，來取代這些傳統做法，那就犯上了理性致命的自負。

秋風認為，有了對有限理性的認識，自由主義者便應放下全盤改革的虛妄，轉而於局部制度性改革的努力，尤其應在憲政制度上尋求一漸進的改變。他說：“在周德偉的思想典範刺激下，過去幾年中，我一直尋找現代中國思想和政治的中道傳統。在清末立憲者、張君勱、陳寅恪、周德偉、現代新儒家等等看似相互沒有關係的人物和思潮之間，存在着內在而深刻的關聯。我將他們概括為“現代中國的保守—憲政主義思想與政治傳統”。他稱這是中道的自由主義，因為“與之相比，激進革命傳統固然是‘歧出’，因其在政治上傾向於專制，在文化上趨向於單純的破壞。現代自由主義傳統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偏激，這一點與革命傳統相同；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軟弱無力，這一點又讓它敗給革命。保守—憲政主義傳統則保持了自由的革命的中道。”⁹ 如果我們把眼光從憲政改革的範疇伸延到政府的公共和財經政策的檢討和芻議，我相信夏道平在 1950 年代開始在台灣輿論界中在這方面依據海耶克式的自由主義提出的觀點和建議，和秋風論及的中道自由主義是有共通點的。¹⁰ 夏道平之後的吳惠

9 秋風，〈經過哈耶克重新發現和轉化的傳統〉，見周德偉《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第 1-29 頁。

10 夏道平，〈我在〈自由中國〉〉，台北：遠流，1989 和《自由經濟的思路》，遠流，1989。

林和謝宗林在台灣這方面的努力，正是這傳統的延續。¹¹

要全面充分地檢視海耶克對戰後中國自由主義的影響，是一項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和理論研究中很值得去做的計劃。除了上述提到 1950–80 年代海耶克對戰後台灣的自由主義者的影響之外，海耶克的思想對 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在市場改革方面，和對大陸的自由思想的去激進化的保守轉向上也發揮很大作用。一些大陸知識分子，例如英年早逝的鄧正來曾經為了譯介海耶克的論說而閉關八年，翻譯和著述了幾百萬相關的文字，更是值得重視的努力。¹² 我希望日後有機會在這方面作進一步的研究。

《通向奴役之路》

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前輩學人這本 1962 年《通向奴役的道路》的譯本，大致而言，可說是高水平 and 準確之作。難怪後來中國大陸的一些譯本，也依據滕、朱兩位的翻譯而出版。¹³ 比起殷海光 1950 年代在台灣의 選譯本¹⁴ 來說，這本 1962 年的譯本的水準和準確性我認為都是較優秀的。

這次我協助香港商務印書館編審滕維藻和朱宗風的《通向奴役之路》的譯本，基本上把原譯文保留了下來。其中我決定對譯文作出修正的內容，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原翻譯明顯的

11 吳惠林，《台灣自由經濟之路》，華泰，2002。

12 請參考鄧正來，《規則·秩序·無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13 例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和京華出版社 2000 年署名譚爽譯的《通往奴役之路》。

14 見 F. A. Hayek 著，殷海光譯，《殷海光全集 4：到奴役之路》，台大出版社，2009。

錯譯。例如“第二卷”錯譯成“第2章”，“博士”錯譯成“教授”等。第二類修正是一些學術上的專門修辭。如果滕、朱兩位當時的翻譯與現在的標準用法不合，而我認為現在的標準用法較準確的話，我也作出了修正。明顯的例如原譯文把海耶克原本的nationalism翻成“國家主義”，現在修正為“民族主義”。原譯文把democracy譯成“民主主義”，現在基本上修正為“民主”。第三類則是原譯文的翻譯對理解海耶克的思想會產生誤導，所以須把譯文修正過來或作出改善，以避免在理論上錯解了海耶克的思想。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海耶克在談到英式法治下的規則所具備的Formal的特質這一點。由於海耶克認為英式法治下相關的法和規則，主要是用來規範程序上的公正或個人受到保障的領域，而不是實質地為達到任何共同或具體目的而服務，因此，這類的法和規則相對於有實質指向性(substantive)的規則而言，其特質是形式性(formal)的。滕維藻和朱宗風的譯文在這方面通常都把海耶克原文中的formal rules或formal law譯成是“正式的規則”或“正式的法律”。但依照海耶克的思路，英國國會依照法治精神制定和通過的法規自然是“正式”的，但就其性質而言，這些法規應是“形式性”的而非具“實質指向性”的，因此我認為有必要把滕、朱兩位的譯文從“正式”改為“形式”，以免對海耶克的理論產生誤讀。

上述三類的修正，我直接在原譯文中作出了修改，並沒有保留原譯文。另一類修改，則是海耶克的原文本身出錯的，滕、朱兩位的譯文因此也把原文的錯誤直譯了出來。在此，我在本書保留了原譯文，但在錯誤之處加上[編審按：]這括號，把正確的

資料在括號中寫出來。這方面的修正，我主要得益於在此導言文首提及的 Caldwell 教授。他 2007 年為英文海耶克全集編輯 *The Road to Serfdom* 時，花了不少工夫把海耶克原文在資料上的一些錯誤改正了過來，我也趁這個機會在此譯文版本中把原文的錯誤指出來。

最後，原文和原譯文在此版本都採用了同頁註腳的方式紀錄了海耶克或譯者的註解，這一點我在本書保留了下來。這篇導言我也採用了同頁註腳的方式記錄我的註解。但在本書的原內文和翻譯本中，我作出編審註解時，則採用了文末註腳的方式，以資識別。

多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給我機會編審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翻譯的這本海耶克的小經典。這個版本餘下來的任何不足和錯漏，責任自然在我，望各位高明指正。

2016 年 9 月 3 日

原書序言

形形色色的用語表達了我們時代的口頭禪：“充分就業”，“計劃”，“社會安全”，“不虞匱乏”。當代的事實所顯示的，卻是這些事情一旦成為政府政策的有意識的目標，就沒有一件能夠獲得成功。這些漂亮話只有傻瓜才會相信。它們在意大利把一個民族誘入歧途，使他們暴骨在非洲的烈日之下。在俄國，有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有三百萬富農被清洗。在德國，1935-1939年之間曾達到充分就業；但是六十萬猶太人被剝奪了財產，四散在天涯海角，或長眠於波蘭森林中的萬人塚內。而在美國，儘管一次又一次的抽水，可是唧筒也從來沒有灌得很滿；只有戰爭才解救了那些“充分就業”的政治家們。

迄今為止，只有屈指可數的著作家敢於探索上述口頭禪和現代世界中屢次出現的那種恐怖之間的聯繫。現在卜居英國的奧國經濟學家海耶克是這些著作家之一。在目睹了德國、意大利及多瑙河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僵化以後，又眼見英國人所受的統制經濟的思想之毒愈來愈深，不禁憂心忡忡。這種思想直接來自德國的華爾特·臘特瑙（Walter Rathenau）、意大利的工團主

義者——而且還來自敢於從前人沒有明說的國家控制論得出結論的希特勒。海耶克此書——《通向奴役之路》——是在這徘徊踟躕的時刻中的一個警告、一聲呼號。他對英國人，不言而喻的也是對美國人說：停住，看看，仔細聽聽。

《通向奴役之路》是審慎的、不苟的、邏輯性很強的。它不是譁眾取寵之作。但是，“充分就業”、“社會安全”、“不虞匱乏”這些目標只有在作為一個解放個人自由活力的制度的副產品時，才有可能達到，這個邏輯是無可爭辯的。當“社會”、“全體的利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成為國家行動的壓倒一切的標準時，沒有一個人能夠給他自己的生計作出計劃。因為，如果“社會”的利益或“普遍的福利”高於一切，國家“計劃者”必然要竊據能夠佔領經濟體系的任何領域的大權。如果個人的權利成為阻礙，個人的權利就必須去掉。

國家“力本論”的威脅，在那些仍然保持着有條件的行動自由的一切產業界中，引起了巨大的、常常是不自覺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影響了行動的原動力。正如過去人們致力於跟市場鬥智一樣，他們現在必須致力於跟政府鬥智。不過這裏有一點不同：市場因素至少是相對地服從於客觀的規律，而政府則不免受許多一時的念頭的支配。一個人可以把前途寄託在根據存貨數量、市場飽和點、利率、購買者需要趨勢曲線而作出的判斷上。但是對於一個旨在排除市場客觀規律的作用而且在“計劃”的名義下只要願意就可以隨時隨地這樣做的政府，個人又怎能跟它鬥智呢？彼得·德魯克爾 (Peter Drucker) 曾經挖苦過“計劃者”，說他們全是沒有樂譜的即興演奏家。他們給個人造成的是不穩定，而不是

穩定。正如海耶克明白指出的，這種不穩定的最終結果不是內戰就是防止內戰的獨裁制度。

“計劃”以外的可行之道就是“法治”。海耶克並不是放任政策的崇奉者；他相信一種有利於企業制度的規劃。規劃並不排斥最低工資標準、衛生標準、最底額的強制性社會保險。它甚至於也不排斥某些類型的政府投資。但重要的是，個人必須事前知道法規章程將如何起作用。如果有一個中央計劃當局的“力本論”罩在頭上，個人是無法計劃他的企業、他自己的前途，甚至他自己的家務的。

在有些方面，海耶克比現代英國人更加是一個“英國人”。他在一定程度內屬於偉大的曼徹斯特傳統，而不是屬於韋伯夫婦學派。可能他也比現代美國人更加是一個“美國人”。如果這樣的話，我期望《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能在美國在可能範圍內有最廣泛的讀者。

約翰·張伯倫 (John Chamberlain)

紐約州，紐約市，1944年7月

前 言

當一個社會問題的專業研究者寫了一本政治性的書的時候，把這一點說清楚是他的首要責任。這是一本政治性的書。我不想用社會哲學論文之類的更高雅虛矯的名稱來遮掩這一點，雖然我未嘗不可以那樣做。但是不管名稱如何，根本之點還是在於我所要說的一切全都肇源於某些終極的價值。我希望在這本書中還恰如其分地履行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職責，就是毫不含糊地徹底闡明，整個論證所依據的那些終極的價值究竟是甚麼。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在這裏補充說明。雖然這是一本政治性的書，我可以極其肯定地說，本書中所申述的信念，並非決定於我個人的利害。我想不出有甚麼理由能夠證明，我所認為合意的那種社會，對於我個人會比對我國大多數人民提供更大的利益。其實，我的社會主義的同事們常常告訴我，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在我所反對的那種社會裏，一定會居於遠為重要的地位——當然，如果我能夠使自己接受他們的觀點的話。我覺得同樣肯定的是，我所以反對那些觀點，並不是由於它們和我在成長時期所

持的觀點不同，因為它們正是我年輕時所持的觀點，而且這些觀點使我把研究經濟學作為我的職業。容我對那些依照當前的時尚，要在每一個政治見解的申述中，找尋利害動機的人們附帶說一聲，我本來是大可不必寫作或出版這本書的。這本書必定要得罪許多我盼望與之友好相處的人們；它也使我不得不放下那些我覺得更能勝任，而且從長遠看來我認為是更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它肯定會有害於對那些更嚴格的學術工作的結果的接受，這種學術工作是我全部心願所嚮往的。

如果說我不顧這些而把寫作這本書視為我不可逃避的任務，這主要是因為在當前的關於未來經濟政策問題的討論中，存在着一種不正常的和嚴重的現象，這種現象還沒有充分地被大家覺察到。實際情況是，幾年以來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被吸收到戰爭機器中去了，他們都因為官職在身而不能開口，結果關於這些問題的輿論，在驚人程度上為一批外行和異想天開的人、一些別有用心或賣狗皮膏藥的傢伙所左右。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尚有著述餘暇的人，很難對這些憂慮保持緘默——當前的種種趨勢必然在許多人心目中引起這種憂慮，只是他們無法公開表達它們——雖然在另一種情境下，我一定是樂於把對國家政策問題的討論，讓給那些對這項任務更有權威、更能勝任的人去做的。

本書的中心論點，曾在1938年4月《現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雜誌上〈自由與經濟制度〉(“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一篇論文中初次簡單提出，這篇論文後來增訂重印作為吉迪恩斯(H. D. Gideonse)教授為芝加哥大學

出版社編輯的《公共政策叢刊》之一（1939年）。上述兩種書刊的編輯和出版人允許我引用原作的若干段落，我在此謹致謝忱。

F. A. 海耶克

引 論

很少有甚麼發現比揭露思想根源的發現更惹人憤怒了。

——阿克頓勳爵 (Lord Acton)

當代的種種事件和歷史的不同，在於我們不知道它們會產生甚麼結果。回溯既往，我們能夠評價過去事件的意義並探索其相繼引起的後果。但當歷史正在進行的時候，對我們來說，它還不是歷史。它引導我們進入未知之境，而我們又絕少機會瞥見前途的景象。假使我們真的能夠把同樣的事件重新經歷一番而不失去我們先前的聞見的記憶，情況就會兩樣。在我們看來，事情將顯得多麼不同啊；我們目前很不注意的一些變化將會顯得多麼重要，並且往往是多麼令人吃驚啊！人類永遠不會具有這種經驗，也認識不到任何規律是歷史必須遵循的，這也許是一件幸事。

然而，雖則歷史從來不會完全重演，並且正因為任何事態發展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才能在某種程度上汲取過去的教訓以避免同樣過程的重複發生，人並不需要成為先知者才能曉得臨頭的大難。經驗和興趣的一種巧合，也往往會把人們還很少注意的

事件的某些方面展示在某一個人的眼前。

以下各章是一種經驗的產物，這種經驗和重新經歷一段時期是很近似的——或者最低限度也是對於一種非常相似的思想演變的重複觀察。雖然這種經驗是一個人一個國家內不易取得的，但在某種情況下長期地在不同的國家輪流居住的人是可能取得這種經驗的。儘管大多數文明國家的思潮所受的各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們未必在同一時間或以同樣的速度發生作用。因此，一個人從一國遷居到另一個國家，有時就會重複地看見類似的思想發展階段。這時他的感覺就會變得特別敏銳。當他又一次聽到他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以前就已經接觸過的主張和方策時，這些主張和方策就具有新的意義，成為一定的趨勢的徵兆。它們顯示出事物的發展即使不是必然地、至少也是可能經過類似的過程。

現在必須說出這樣一句逆耳的真話：我們有重蹈德國的覆轍的危險。誠然，這種危險並非迫在眉睫，英國和美國的情形和近年來在德國所發生的情況還相距很遠，很難使人相信我們是在朝着同樣的方向前進。不過，路程雖很遙遠，但它卻是一條愈往前走就愈難回頭的道路。如果說，從長遠來看我們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但是在眼前我們卻受自己所創造的觀念的束縛。我們只有及時認清危險，才有希望化險為夷。

英國和美國並不是和這次戰爭中的德國即希特勒德國有甚麼相似之處。但是研究思潮的人不會看不見，第一次大戰期間及戰後的德國思想趨勢和目前各民主國家的思潮之間，不僅僅存在着表面的雷同。在民主國家中，目前確實存在着一種同樣的決

斷，要把為國防的目的而建立的國家組織保持下去作為建設之用。在這些國家裏也有着同樣的對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鄙視，同樣的偽裝的“現實主義”甚至犬儒主義，同樣的對於“不可避免的趨勢”的宿命論的接受。並且我們大多數咄咄逼人的革新家竭力要我們從這次戰爭吸取的教訓中，至少十有八九是德國人從上次戰爭中取得的教訓，助長了納粹制度的產生的也正是這些教訓。在這本書中我們將有機會表明，我們還在一大批其他的問題上在十五到二十五年之內似乎要步德國的後塵。雖然誰也不歡喜人家提醒他這一點，可是，正如近年來瑞典成為進步派目光所注的典型的國家一樣，德國的社會主義政策開始被進步派普遍地奉為仿效的楷模，到現在並沒有經歷多少年。那些記性更好的人誰都知道在上次大戰以前至少有一個世代之久，德國的思想與德國的實踐曾經多麼深刻地影響了英國的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的理想和政策。

作者自成年以後大約有一半的歲月是在故鄉奧地利度過的，與德國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觸，另一半則是在美國和英國。在後一時期中，作者越來越相信，至少有某些曾經在德國毀滅了自由的勢力，現在也在這裏作祟，而這種危險的性質和根源，可能還比在德國更少為人所了解。現在仍然沒有被人認清的最大的悲劇是，在德國，大都是那些好心人，也就是那些在民主國家裏受人尊敬和奉為楷模的人，給現在代表了他們所深惡痛絕的一切的勢力鋪平了道路，如果這些勢力不是實際由他們創造出來的話。我們能否避開類似的命運，全要看我們能否正視危險並且有否決心修正哪怕是我們最珍惜的希望與抱負，如果它們被證

明是危險的根源的話。不過現在還很難看得出來，我們有向自己承認可能已經犯了錯誤的精神勇氣。還很少有人願意承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並不是對於前一時期的社會主義趨勢的一種反動，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甚至當共產主義俄國和國社主義德國內部制度的許多令人憎惡的特點的相似性已經為人廣泛承認的時候，大多數人還不願意看到這個真理。結果，自以為與納粹主義的荒謬絕倫有天壤之別並真心誠意地憎恨其一切表現的人們，卻同時在為一些實現起來就要直接導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務。

對不同國家中的各種發展所作的一切平行線式的對比，當然是不可置信的；但是我的論證主要不是根據這些對比。我也並不認為這些發展趨勢是無法避免的。如果真是無法避免的話，就不必寫這本書了。如果人們及時了解自己的努力可能引起的結果，這些發展是可以防止的。不過，直到最近，使他們正視危險的嘗試還很少有希望獲得成功。但是，對整個問題進行比較充分討論的時機現在似乎已經成熟了。這不僅是因為現在問題已經更廣泛地為人所認識，而且更有許多特殊的理由，使我們在目前這個關頭，非直接正視這些問題不可。

有人也許會說，現在不是提出這種大家的意見針鋒相對的問題的時候。但是我們所談的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黨派問題，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也與各政黨之間爭執的問題無關。某些集團可能比其他集團希望較少的社會主義，或某些集團之所以希望社會主義是出於某一集團的利益，另一集團又是為了另一集團的利益，這些都並不影響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重點在於，如果我們

要找出一些其見解能影響今後的發展的人來，那麼在今日的民主國家中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全都是社會主義者。如果說強調“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者”這一點已經不再時髦了的話，這僅僅是由於事實已是再明顯不過了。幾乎沒有任何人還對我們必需繼續走向社會主義有所懷疑，而多數人也只是為了某一個階級或集團的利益，才企圖轉移這個運動的方向。

因為幾乎每個人都希望它，我們才向這個方向前進。並沒有甚麼客觀的事實使它成為不可避免的。我們在後面會有必要談談所謂“計劃”的不可避免性。主要的問題是這個運動會把我們引向何處。那些現在由於他們的深信不疑而賦予這個運動以一種不可抗禦的衝力的人們，如果開始明白那些迄今還只有少數人了解憂慮的事情，他們不會因恐懼而退縮，放棄半世紀來吸引了這麼多好心人去進行的那種追求嗎？我們這個世代的共同信念將把我們引向何處，並不是哪一黨的問題，而是有關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一個具有最重大意義的問題。我們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自覺地為締造我們的未來而努力，而實際上竟會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的奮鬥目標正好相反的結果，還能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我們現在所以應當認真努力去了解那些已經建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力量，還有一個更為迫切的理由，就是這將使我們能夠了解我們的敵人和我們之間有關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迄今對於我們為之而奮鬥的崇高理想還很少認識。我們知道我們是在爭取那種根據我們自己的理想來塑造我們生活的自由。這很有份量，但還不夠。敵人使用宣傳作為其主要武器之一，這種宣傳不僅是空前的喧囂，而且還是空前的狡猾，僅僅認識這一點還不能

使我們具有抵抗這樣一種敵人所必需的堅強信念。當我們必須在這種宣傳不會隨着軸心國家的失敗而消失的敵人所控制的國家，或其他地方的人民中擊退這種宣傳時，僅僅認識更顯得不夠。假使我們要去向別人證明，我們所要爭取的理想值得他們予以支持，那麼僅僅認識這一點也還是不夠的，要它引導我們去建立一個不會遭受舊世界所遭受到的那種危險的新世界，也顯得不夠。

民主國家戰前和獨裁者打交道時，也同在宣傳的努力和關於戰爭目的的討論中一樣，表現出一種內在的不穩定和目標的不明確（這種情況只能用他們對自己的理想，以及他們和敵人之間的各種不同之處的性質的認識上的混亂來解釋），這是一種可悲的事實。我們之所以被迷惑，是因為我們不相信敵人在公開宣佈某些我們所共有的信仰時，是真心誠意的，也同樣因為我們相信敵人的某些其他主張是真心誠意的。左翼各政黨不是和右翼各政黨一樣，由於相信國社黨是為資本家服務並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而受騙了嗎？希特勒制度中有多少特點，不曾由那些最出人意料方面來向我們推薦模仿，而不了解那是希特勒制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並和我們希望保持的自由社會不相容呢？在戰前和戰爭爆發以來，由於我們不了解我們所面臨的敵人而鑄成大錯的次數是驚人的。情況居然好像是我們不要去了解產生了極權主義的那種發展趨勢，因為那樣一來就要毀壞某些我們決心抱住不放的最心愛的幻想。

在沒有了解現在支配着德國人的那些觀點的性質和成長過程以前，我們和德國人打交道是不會成功的。一再提出的認為德國人本身生來就是邪惡的那個理論是很難站得住腳的，就是那些

抱有這種主張的人也未必相信它是很正確的。它沾辱了為數眾多的一系列盎格魯—薩克遜思想家，他們在過去一百年中心悅誠服地吸取了德國思想中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東西。這個論調忽視了這一事實，即八十年前穆勒（John Stuart Mill）撰寫他的偉大論著《論自由》（*On Liberty*）時，兩個德國人——哥德（Goethe）和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¹——給他的影響比任何都大。它也忘記了這一事實，即國家社會主義的兩個最有影響的思想前驅，卡萊爾（Thomas Carlyle）和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一個是蘇格蘭人，一個是英格蘭人。對於那些不惜採用德國種族理論中最惡劣的手法來給自己的觀點辯護的人們，這種觀點的淺薄粗陋實在是一種恥辱。

問題不在於德國人本身何以是邪惡的，從先天方面來說，他們也許並不比別的民族壞，問題在於弄清究竟是甚麼環境使過去七十年中某一特別思潮得到逐步發展並取得最後勝利，並研究何以這種勝利終於使其中最壞的成分支配一切。僅僅仇恨德國人的一切而不是仇恨現在支配德國人的那些特殊的觀念是十分危險的，因為那些滿足於這種仇恨的人會看不見真正的威脅。我擔心這種態度常常就是一種逃避主義，其根源是不願意認識那些並不只限於德國才有的傾向，以及不敢重新考查，並且必要的話放棄掉那些我們德國接受過來的信念，即我們現在仍然和德國人過去那樣沉迷於其中的那些信念。有人認為只是由於德國人特有的邪

1 由於有些人可能認為這樣說法未免誇張，因此值得引用摩爾勒勳爵（Lord Morley）的陳述。他在《回憶錄》，（*Recollections*）中談到所謂“公認之點”（*acknowledged point*）時，認為《論自由》一文的主要論點“並不是始創的而是而源於德國”。

惡才產生了納粹制度，這種主張容易成為一種口實，把正是產生那種邪惡的制度強加於我們頭上，因此是加倍危險的。

本書所提出的對於德國和意大利發展過程的解釋，和大多數外國觀察家以及從這些國家逃亡出來的大部分人所作的解釋，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本書的解釋是正確的話，它也就會說明，一個像大多數流亡者和英美報紙的國外通訊員那樣持有現時流行的社會主義觀點的人，為甚麼幾乎不可能從正確的角度來觀察各種事件。把國家社會主義僅僅看作是在社會主義進展下其特權和私利受到威脅的人們所推動的一種反動，這個膚淺而使人誤解的看法，很自然地受到所有這樣一些人的支持。他們雖然曾在那導致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中活躍一時，但在發展過程的某一階段卻中止了活動，並且因此他們和納粹發生衝突，被迫離開了本國。但是，就人數而論他們是僅有的重要的納粹反對派這一事實，只不過說明了：從廣義上講，所有德國人幾乎都已成為社會主義者，而舊有涵義所指的自由主義已為社會主義所排斥。像我們希望加以說明的那樣，德國國家社會黨“右翼”和“左翼”的現存的衝突，是敵對的社會主義派別之間常常發生的那種衝突。但是，如果這個解釋是正確的，那就意味着許多仍然堅持他們的信念的流亡社會主義者，現在雖然懷有最善良的願望，卻正在幫助其寄居國家走上德國所走過的道路。

我知道，許多英美朋友對於他們偶然聽到的由德國流亡者（這些人的真正社會主義的信仰是無可懷疑的）流露出來的半法西斯觀點，有時深為震驚。但是，雖然這些觀察家把這一點歸咎於他們是德國人的緣故，真正的解釋則是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不

過他們的經驗已經把他們帶到遠遠超出英國和美國的社會主義所已經達到的境界。自然，德國社會主義者在本國曾從普魯士傳統的某些特殊方面得到極大的支持；而在德國雙方都引以為榮的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這種淵源，使我們的主要論點更增加了根據。² 但如相信產生極權主義的是一種德國的特種因素而不是社會主義因素，那就錯了。國家社會主義之所以興起，是由於社會主義觀點的流行，而不是由於德國與意大利和俄國所共有的普魯士主義。同時，國家社會主義是從群眾中興起，而不是從深受普魯士傳統的熏陶並深受其惠的各階級中興起的。

2 在社會主義和普魯士國家組織（有意識地自上而下起來，為其他所無）之間確實存在某種淵源，這是不可否認的，法國早期社會主義者就已坦白地承了一點。遠在用管理一個單獨工廠的同樣原則去治理全國這理想鼓舞了十九世紀社會主義以前，普魯士詩人諾伐里斯（Novalis）就曾嘆息過：“從來沒有一個別的國家，像威廉（Frederick William）逝世以後的德國那樣像一個工廠那樣被治理過”（參看諾伐里斯〔哈登堡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信仰與愛情或國王與王后》〔*Glauben und Liebs, oder der König die Königin*〕，1798 年出版）。年出版）。

第一章 被委棄了的道路

一個綱領，其基本命題並非認為追求利潤的自由企業制度已經在這一代失敗，而是還未經嘗試。

——羅斯福 (F. D. Roosevelt)

當文明的進程發生一個出乎意料的轉折時——即當我們發現我們不像預期的那樣繼續前進，而是受到了我們認為和以往世代的蒙昧無知相關聯的諸般邪惡的威脅時——我們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會歸咎於我們自己。我們不是都已經根據自己最高明的見解而努力，我們中的許多最優秀的人不是已經為了建立更美滿的世界而不停息地工作嗎？我們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已經都用來尋求更多的自由、正義和繁榮嗎？如果結果和我們的目標相距甚遠——如果與我們迎面相對的不是自由和繁榮，而是奴役和苦難——那必定是由於邪魔的勢力顛倒了我們的心願，我們成了某種邪惡的力量的犧牲品，在繼續走向美好未來的道路以前，必須征服那些邪惡勢力，這不是很清楚嗎？不管我們在斷定究竟誰是罪魁禍首這一點上差別有多大——是不義的資本家，

還是某一民族的邪惡精神，是我們的前輩的愚蠢，還是那個我們雖曾對之戰鬥了半個世紀之久但尚未完全推翻的社會制度——我們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這樣一點：在上一世代中成為大多數善意的人所共有的、決定我們社會生活主要變化的指導思想，不可能是錯誤的。我們幾乎願意接受對於我們文明的當前危機的任何解釋，但除開這一點，即：世界的目前狀態可能是我們自己這方面的真正錯誤的結果；對於某些我們所最珍惜的理想追求，明顯地產生了與我們所預期完全不同的結果。

當我們把全副精力用於爭取這次戰爭的勝利結束時，有時難以憶及：即使在戰爭發生以前，我們現時為之而戰的價值，在我們這裏已受威脅，在別處則已毀滅。雖然現時為生存而戰的敵對各國代表着各種不同的理想，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這種衝突是從不久以前還是共同的歐洲文化中的各種思想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而那些終於形成極權主義制度的趨勢，並不限於那些已經深陷於這種制度之中的國家。雖然我們目前首要的任務是必須贏得這場戰爭，但是戰爭勝利只不過是給我們另一個機會，使我們得以面對根本問題，並尋求途徑以防止類似的文明所曾遭遇到的命運。

現在不把德國和意大利或者俄國看作不同的世界，而把它們視作是我們也曾共有的思想的發展結果，似乎是有點困難的。至少就我們的敵人而論，認為他們是完全和我們不同的，他們那裏發生的事情我們這裏絕對不會發生，這樣做當然是比較容易和更令人安心一些。但是這些國家在極權主義制度興起以前那些年代的歷史所表現的特點中，很少是我們所不熟悉的。外部所以

發生衝突，是因為歐洲的思想正處於一個轉化期中，別的國家在這轉化期中進展得如此迅速，以致於使它們與我們的理想形成了不可調和的衝突，但這並不是說我們自己就置身於這個轉化之外了。

思想的改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目前的狀況，雖則人們並沒有預見到這種結果，而客觀事實中又沒有甚麼自發的變化迫使我們的思想與之相適應，這一點要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了解清楚，也許是特別困難的，正因為在這方面的發展中，他們比多數歐洲民族落後，雖然對他們說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們仍然把現在引導着我們和過去一個世代曾經引導過我們的理想，認作是只能有待於將來才會實現的理想，而不了解過去二十五年中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不僅已經改變了世界，而且也改變了我們的國家。我們依然相信，直到最近我們仍受着那種被含糊地稱為十九世紀的觀念或放任原則的支配。和某些其他國家比較起來，並從那些急於加速變革的人們的觀點來看，這種信念可能有某些根據。不過，雖然直到 1931 年為止，英國和美國只不過是遵循着別人已經走過的道路前進，但是即使在那個時候，它們的變動已經達到這種程度，以致只有回憶到上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年代的人，才能了解一個自由世界究竟是甚麼樣的。¹

1 即在那一年，《麥克米倫報告書》(Macmillan Report) 就已經談到“英國政府近年來注意力之改變，以及政府(不管哪一黨)越來越注意對人民的管理”，並進而談到“國會發覺自己越來越多地致力於那種目的在於管制社會日常事務的立法，現在並干預那些以前被認為完全是在國會職責範圍以外的事情”。而且，在以下事實發生以前，這一段話就應用得着：在同一年後期，英國終於採取了不顧一切的措施，而在短短的不光彩的 1931 - 1939 年這段時間裏，把經濟制度改變得面目全非。

但是，我們的人民至今尚很少覺察的關鍵問題，不僅是上一世代發生的變化之大，而是它們意味着我們的觀念和社會秩序演變方向的完全改變這一事實。至少在極權主義的魔影變成真正威脅以前二十五年期間，我們已經逐漸離開了作為西方文明基礎的根本觀點。我們帶着如此崇高的希望和雄心開始的這個運動，居然使我們直接面對極權主義的恐怖，這一點對於迄今仍然不願將這兩件事聯繫起來的當前一代人來說，乃是一個強烈的震動。但是這一發展只不過證實了我們仍然信奉的自由主義哲學的先輩們的警告。我們逐漸放棄了經濟事務中的自由，而沒有這種經濟自由，就不會產生以往時期的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雖然十九世紀的一些最偉大政治思想家，如托克維爾 (De Tocqueville) 和阿克頓勳爵曾對我們提出過警告，說社會主義意味着奴隸制度，但我們仍然堅定不移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而現在我們已經看見了一種新形式的奴隸制度在我們眼前興起，我們竟已完全忘記了這個警告，以致我們很少想到這兩件事情可能有聯繫。²

現代趨向社會主義的趨勢，不僅對不久的過去、而且對西方文明的整個演進過程意味着何等鮮明的決裂這一點，如果我們不僅對照十九世紀的背景而且從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研究它的話，就顯得很清楚了。我們正在迅速地放棄的不僅是科布登 (Cobden) 和布賴特 (Bright)、亞當·斯密和休謨或者甚至洛

2 即使是已經證明為非常正確的為時很近的一些警告，幾乎也完全被人忘卻。還不到三十年以前，貝洛克 (Hilaire Belloc) 在一本比大多數在事變後所寫的著作更多地解釋了德國所發生的情況的書裏，說明“社會主義原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是產生和兩者都不同的第三種東西——即奴隸國家”（《奴隸國家》，1913年出版，1927年第三版，第xiv頁）。

克和密爾頓 (Milton) 的觀點，而且是在基督教，希臘人和羅馬人奠定的基礎上逐漸成長起來的西方文明的顯著特點之一。不僅是十九和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而且是我們繼承自伊拉斯莫斯 (Erasmus)、蒙泰尼 (Montaigne)、西塞羅 (Cicero)、塔西佗 (Tacitus)、伯里克利斯 (Pericles)、修昔的底斯 (Thucydides) 的基本的個人主義，都在逐漸被放棄掉。

把國家社會主義革命說成是一次反文藝復興運動的納粹領袖，可能是不自覺地說了真話。它是毀滅現代人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建立的文明尤其是個人主義文明的一個決定性步驟。個人主義今天名氣不好，這名詞常常被人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聯繫起來。但是我們所說的與社會主義及一切其他形式的集體主義相對立的個人主義，是和這些東西沒有必然的聯繫的。只有在本書的逐步進程中，我們才能說清楚這兩個相反的主義的對立之處。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的發展，此後逐漸成長和發展成為我們所了解的西方文明。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點，就是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也就是承認在他自己的範圍內，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小，他的觀點和愛好是至高無上的，也就是相信人應能發展自己個人的天賦和愛好。“自由”一詞現在因經常被使用和濫用，以致我們在使用它來表明它當時所代表的理想時，也頗感躊躇。“寬容” (tolerance) 一詞也許是唯一的還能保存這種原則的完整意義的用語，這項原則在那個歷史時期的整個過程中都是處於上升的狀態，只是在近來才又趨於低落，且當隨極權主義國家的興起而完全消失。

從一種嚴格組織起來的等級制度逐漸演變成另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至少能夠嘗試去塑造自己的生活，有機會了解和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演變是和商業的興起密切相關的。新的人生觀隨着商業從意大利北部的商業城市向西北方傳播，經過法國和德國西南部傳佈到荷蘭和不列顛諸島，在沒有受到專制勢力阻抑的任何地方立足生根。在荷蘭和不列顛，它長期得到充分的發展，並且第一次有機會自由生長，成為這些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正是從那裏，在十七世紀後期和十八世紀，它才重新以充分發展了的形式開始傳播到西方和東方，傳播到美洲，傳播到歐洲大陸中部——在那裏，毀滅性的戰爭和政治上的暴虐曾經嚴重地壓制了較早時期的類似發展的開端。³

在近代歐洲歷史的整個時期中，社會發展的總方向，是使個人從他從事日常活動時束縛他的那些習慣的和成規的羈絆中解放出來。至於自覺地認識到個人的自發的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夠產生一種經濟活動的複雜秩序，則只有在這種發展已經有了某些進展之後才有可能。隨後到來的擁護經濟自由的有系統的論證，乃是經濟活動的自由發展的結果，而這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種無意識的沒有預料到的副產品。

個人活力的解放的最大結果，也許是科學的驚人的發展，它隨着個人自由由意大利移向英國和更遠的地方。人類早期發明創造的能力並不較差這一點的證明，就是當工業技術還停留在靜止

3 這些發展中最為重要的而且帶有尚未消失的後果的，就是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時德國資產階級被領地侯王所征服並被部分地毀滅了。

狀態時，已經製成許多高度機巧的玩具和其他機械裝置，以及那些沒有受到限制性管制的某些工業，例如礦業和鐘錶製造業的發展。但是，只要佔支配地位的觀點被認為對全體社會有拘束力，即大多數人關於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夠阻礙個別發明家的道路，少數企圖把機械發明更廣泛地應用於工業的嘗試，其中有些是十分先進的，就很快地被壓制了，並且尋求知識的願望也被窒息了。只是在工業自由打開了自由使用新知識的道路以後，只是在凡是能找到人支持和負擔風險的每件事都可嘗試以後，並且這種支持還必須是來自官方指定的提倡學習的當局以外的地方，科學才得以邁步前進，並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像常有的情況那樣，對我們文化的性質，敵人往往比多數朋友看得更清楚。像十九世紀的極權主義者孔德（Auguste Comte）所敘述的那種“西方的長年痼疾，個體對種屬的反抗”實際是建成我們文化的力量。十九世紀所增益於上一世紀的個人主義的，僅僅是使一切階級都意識到自由，把偶然地和雜湊地成長起來的東西加以系統的和連續的發展，並把它從英國和荷蘭傳播到大部分歐洲大陸。

這種發展的結果超出一切預料。無論何處，阻抑自由運用人類智能的障礙被除去了，人很快地能夠滿足不斷擴大的慾望。雖則由於標準提高而不久即導致社會取陰暗點（人們不再願意容忍的缺點）的發現，但是也許沒有一個階級未曾從普遍進步中獲得顯著的利益。對於這種驚人的進步，如果我們拿目前的標準去衡量的話，那就不是持平之論，這種標準本身就是這個進步的結果，而現在又使許多缺點顯得突出了。要評價這種進步對那些參

與其事的人究竟意味着甚麼，我們必須用它開始時人們所抱的希望和心願去衡量。毫無疑問，它的成就超過了人們最奔放的夢想；二十世紀之初西方世界工人所達到的物質舒適、安全和個人獨立的程度，在百年以前看來是幾乎不可能的。

這一成就在將來可能出現的最重要和最深遠的影響，是對掌握他們自己命運的新的力量的信心、對於改善自己命運的無限可能性的信念，這些都是已經取得的成就在人們當中樹立的。隨着成就也發展了雄心——而人們是具有一切權利懷有勃勃雄心的。從前曾經是激勵人心的希望似乎顯得不夠了，進展的速度已嫌過於遲緩；過去曾使這一進展成為可能的原則，現在被看做是阻抑更快進步的障礙，急於加以掃除，而不是把它視作保持和發展已經取得的成就的條件了。

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沒有甚麼東西使它成為一個靜止的教條，並沒有一成不變的一勞永逸的規則。在安排我們的各項事務時，應該儘量運用社會的自發的力量，而儘可能少地借助於強調這一根本原理，是能夠作千變萬化的應用的，深思熟慮地創造這種使競爭可以儘可能有益地起作用的制度，和被動地接受既定的法規制度，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尤其懸殊。也許對自由主義事業為害最大的，莫過於某些自由主義者單純從某種經驗出發的頑固態度，尤以放任主義的原則為最。不過，就某種意義言，這是必然的和無可避免的。無數的利害關係都能指出某種特殊措施會給某些人以直接的明顯的利益，而其所引起的損害則是遠為間接的，而且是難以看到的，對於這些利害關係，正就是某種一成不變的規則才能起對抗的作用。而且由於有利於工業自由的有力假

定已經毫無疑問地建立起來了，要把它當作毫無例外的規則的強大誘惑力，常常使人難以抗拒。

但是許多自由主義原理的普及者既然採取了這種態度，那就幾乎不可避免：一旦他們的障地在某些點被突破，立刻就會全線崩潰。一個目的在於逐漸改進自由社會制度結構的政策，其不可避免的緩慢進展也進一步削弱了這個障地。這種進展有賴於我們逐步增進對社會力量，和對最有利於這種力量以適宜的方式起作用的條件的理解。由於我們的任務是在促進這些力量並在必要時補充這些力量的作用，首要的前提是先要了解它們。自由主義者對社會的態度，像一個照顧植物的園丁，為了創造最適宜於它生長的條件，必須儘可能了解它的結構以及這種結構是如何起作用的。

任何有見識的人都不應該對這一點有懷疑，即表現了十九世紀經濟政策的原則的那些粗陋的規則只不過是一個開端，我們還有許多東西要熟習，在我們已經前進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無限的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只有我們越來越能夠對我們所需利用的力量從精神上加以掌握，這種進步才得以實現。有許多明顯的任務，例如我們對貨幣制度的管理，壟斷的防止和控制，以及其他方面更為大量的雖不如此顯著但也同樣重要的任務有待着手，在這些方面各國的政府無疑都掌握着為善為惡的莫大的權力；完全有理由這樣希望：只要我們更好地了解這些問題，我們終將能夠成功地使用這些權力。

雖則導向普通稱為“積極”行動的進展必然是緩慢的，並且雖則為了即時的改進，自由主義必得主要憑藉自由所帶來的財富

的逐漸增長，但是它仍須經常抵抗威脅這個進展的種種建議。由於自由主義對於某一個人，不可能提供多於共同進步中的一份，結果它便被看成是一種“消極”的信條。這種進步越來越被視為當然之事，而不再被認為是自由政策的結果。甚至可以這樣說，自由主義的衰退，正是它的成功所造成的。由於已經取得的成功，人們已越來越不能容忍還存在着的缺點，這些缺點現在似乎是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了。

由於對自由主義政策的進展遲緩越來越不能忍耐，由於對那些假自由主義之名為反社會的特權作辯護的人的正當的憤懣，以及由於已經取得的物質進步而被認為似乎是有根據的無限的雄心，結果到本世紀時，對自由主義根本原則的信念，愈來愈被人放棄。已經取得的成就，被認為是永保無虞，萬無一失的財產。人們的眼光專注於那些新的需求，對於這些新的需求的迅速的滿足，似乎由於墨守舊的原則而受到阻礙。人們越來越廣泛地認為，要希望能夠繼續前進，不能再沿着那個使往日的進步成為可能的總的社會體制中的老路走，而是要完全地重新改造社會。問題已不再是補充和改善現存的機構，而是要完全打碎它並換掉它。並且由於新的一代的希望，越來越集中到一些完全新鮮的事情上去了，對於現存社會如何發揮職能的關懷和了解就迅速下降；隨着對自由制度工作方法的了解的日趨低落，我們對於那些依存於自由制度的事物的理解也因之降低了。

這裏不擬討論這種看法的改變如何受到下述因素的促進：即把由於專注於技術問題所產生的思想習慣，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思想習慣不加批判地轉移到社會問題上去，以及這些思想習

慣又是怎樣企圖把不合於它們的偏見的過去的社會研究的成就加以否定，而把一些組織的理想強加到一個不適宜的領域中去。⁴此地所談的只在證明我們對於社會的態度，已經如何完全地（雖然是逐漸地並且幾乎是無法覺察地一步跟着一步）改變了。在這個變化過程的每一階段，那種看來僅僅是程度之差的東西，已經以其累積性的影響，形成了觀察社會的舊的自由主義態度與目前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兩者之間的根本分歧。這種變化對於我們敘述過的趨勢形成了一個完全的逆轉，完全放棄了曾經創造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傳統。

根據目前流行的見解，問題已經不再是如何最好地運用存在於自由社會之內的自發力量。我們實際上已在着手取消那些產生難以預見的結果的力量，並以對一切社會力量加以集體的和“有意識的”指導，借以達到預定目標的辦法來替代市場這個非個人的和不知名的機制。說明這種分歧的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一本受到廣泛讚揚的著作所採取的極端的立場，關於這本書中的所謂“為自由而計劃”的綱領我們還要不止一次地加以評論。曼海姆博士 (Dr. Karl Mannheim) 寫道：“我們從來沒有建立和指導整個自然體系的必要，像今天不得不對社會所做的這樣，……人類越來越趨於調節其全部社會生活，雖然從來沒有人企圖去創造第二個自然界”。⁵

4 著者曾努力探索這一發展的開端，見發表於 1941-1944 年《經濟學》(*Economica*) 雜誌的兩篇連續的論文：《科學主義和社會研究》(*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 和《科學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5 《復興時代的人和社會》(*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1940 年出版，第 175 頁。

這種思想傾向的變化和思想在地域間傳播的改向兩者間的一致，是很有意義的事。兩百多年來英國的思想是向東傳播的。曾經是在英國建成的自由制度似乎注定要傳佈到全世界。到了1870年左右這些思想的流行可能已擴展到東方的最遠邊界。從此以後它開始退卻，一套不同的、並不真正是新的而是很舊的思想，開始從東方西進。英國喪失了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內的思想領導權，而成為思想輸入國。在以後六十年中德國成為一個中心，從那裏，注定要統治二十世紀世界的思想向東西傳佈。無論是黑格爾或馬克思，李斯特 (List) 或希摩勒 (Schmoller)，桑巴特 (Sombart) 或曼海姆，無論是比較激進形式的社會主義或僅僅倡導“組織”“設計”的不那麼激進的社會主義，德國思想到處通行，德國的制度也到處被模仿。

雖然大部分新思想，尤其是社會主義，並非起源於德國，但是它們是在德國完成的，並且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紀的最初二十五年，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德國在這一時期中曾經在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的發展中起了多麼可觀的領導作用；社會主義在英國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以前一個世代，德國國會中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社會主義政黨，並且直到不久以前，社會主義的理論發展，幾乎完全是在德國和奧國進行的，因此，即使今天俄國人的討論，也大都是從德國人中止的地方繼續進行的，這一切現在常常都被人們忘記了。大部分英國和美國的社會主義者還不知道，他們現在才開始發現的大部分問題，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老早已經徹底討論過了。

德國思想家之所以能夠在這一時期中對整個世界在精神上

起了如此重大的影響，不僅得力於德國所取得的偉大物質進步，而更得力於這一百年來，德國再度成為共同的歐洲文明的主要的甚至領導的成員時，德國思想家和科學家所贏得的非凡聲譽。但是它不久就轉而支持那些從德國向外傳播的與歐洲文明的基礎相對立的思想了。而德國人自己——至少是他們中間那些傳播這種思想的人——是充分了解這個衝突的：這在納粹時代以前，對他們來說，從前是歐洲文明的共同遺產的東西現在成為所謂“西方的”文明，這裏“西方的”一詞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指整個“西方”而言，而是指萊茵河以西而言。這種意義的“西方”就是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自由貿易與任何形式的國際主義或對和平的熱愛。

但是儘管數目越來越多的德國人，對於“淺薄的”西方思想懷抱着掩蓋不住的輕蔑，或者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西方的人民卻仍繼續輸入德國思想，甚至被欺騙得相信他們自己以前的信念，不過是把自私的利益加以合理化，自由貿易不過是為了促進英國利益而捏造出來的理論，並且英國和美國的政治思想已經陳舊不堪，成為可恥的東西了。